

历史的观念译丛

历史知识理论

[德]德罗伊森 著
耶尔恩·吕森 胡昌智 选编
胡昌智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5—32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知识理论/(德)德罗伊森著;胡昌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

(历史的观念译丛)

ISBN 7-301-10164-3

I. 历... II. ①德...②胡... III. 德罗伊森, J.G. (1808 ~ 1884)-史学-思想 IV. K0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5497 号

Historik

by Droysen, Johann Gustav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ed. Peter Leyh, Bd. 1, Stuttgart 1977

根据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彼得·赖考订版)第一卷选译

书 名:历史知识理论

著作责任者:[德]德罗伊森 著 胡昌智 译

责任编辑:岳秀坤

标准书号:ISBN 7-301-10164-3/K·0431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1印张 117千字

2006年7月第1版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 / I

译者前言 胡昌智 / VII

引 论 耶尔恩·吕森 / 1

序 言 / 1

第一章 导论 / 7

一 历史 / 7

二 历史方法 / 10

三 历史知识理论的任务 / 13

第二章 方法论 / 17

一 问题之提出与材料收集(Heuristik) / 17

二 史料考证(Die Kritik) / 25

三 解释(Die Interpretation) / 28

第三章 系统论 / 59

一 历史活动中的素材 / 61

二 历史活动中的组织 / 61

三 历史活动中的工作者 / 83

四 历史活动中的目的 / 87

第四章 体裁论 /91

附录一 自然与历史 /119

附录二 Historik 德文版第一卷详细目录 /131

《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

序一

在跨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当下,如影相随的是,我们面对着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紧迫要求,即必须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及特殊性。由中外学者携手组织的这套丛书,将致力于把西方有关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话语带入中国历史文化的园地。

历史论题是人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元素。在历史中,人们形成并且反映了他们与其他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与他者的差异。在归属感和差异的宽泛视界中来看待“世界诸文明”,人们才能够谈及“文化认同”。历史学家们的专业学术工作往往涉及到并依赖于认同形成的文化过程。由于这种牵涉,无论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政治都在他们的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不管学术性的历史研究仅仅只是作为资政的工具,还是因其方法的合理性而有着特别功能,这都已经是公开的问题。

关于历史思维的学术地位的许多讨论,还有它对“客观性”或普遍有效性的执著,都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思维之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思维获得了学术学科或者说“科学”(Wissenschaft,采该词更宽泛的意义)的形式。历史学研究的传统,其自尊就在于,它声称与非专业历史学相比有着更高层次的有效性。一般用的词就是“客观性”。与这种对客观性的执著相反,许多重要论述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这牵涉到他们与各自国家历史文化的相互关系。例如,后现代主义极力否认客观

性这种主张,并且指出,尽管历史研究有其方法的合理性,而在历史研究之外的政治利益、语言假定和文化意义标准等等,历史的解释却对它们有一种根本的依赖。

在意识到了记忆的作用,并且意识到了非专业性因素在异彩纷呈的人类生活领域中表现过去的作用之后,发生在历史学内外的、有关历史思想以及它作为学术学科的形式讨论,就因这种新的意识而被扩大了。在人类生活的文化定向中,记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似乎要取代历史在那些决定历史认同的行为中所处的核心位置。这样一种更迭是否会造成足够重要的后果,影响到历史在民族文化生活中的角色,这一点还悬而未决。只要记忆与“实际发生的”经验相关,历史就仍然是对集体记忆中这种经验因素的一种言说。

在反思历史思想与职业历史学家的工作时,这种视界的扩展因为如下事实而获得了额外的扩大和深化,即:人们为了理解现在、期盼未来而研究过去的方式存在着根本的文化差异,没有这样的洞见,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历史。既然认同关系到与他者的差异,而历史是呈现、反思和交流这种差异的领域,历史学家的工作就必然一直处在对付这种差异的张力之中。“文明的冲突”便是一个口号,它标明,通过回忆和历史形成的认同中存在着紧张因素。

既然认同不只是界定和奋争的事情,它同时还是理解和认知,为此,这双重因素在历史话语中都必须主题化。每一种认同都因识别出他者而存在,而各种认同或认同的文化概念之间的张力以至于斗争或冲突,都不得被理解为一种认知的要求。是什么使得他者出现差异呢?对此不理解,认知就不可能实现。这样,就必须了解他者的差异中那些强有力的文化要素和过程。

进而,若缺少贯穿这种差异的可理解性原则,认知也不可能。就学术性话语的层面而言,在将历史认同主题化,使之成为差异的

一个事例时,这些普遍的要素和维度与专业性历史思维的话语特征有着本质上的关联。

这就是本丛书的出发点,它想把西方世界人们理解、讨论、扩展、批判和利用历史的途径告诉汉语世界。

这套丛书可谓雄心勃勃,它试图展现西方历史话语的整个领域。在思考历史的西方人眼中,西方历史思想是什么?谁的观点成了有影响观点?想象一种单一的西方历史思想类型,并以之与非西方的中国人或印度人的历史思想相比对,这相当容易。但更进一步,人们就会发现,西方并没有这样一种类型,即单一的“观念”、“概念”或者“根本”。相反,我们找到了一种话语,它呈现出各种不同概念、观点和实际作用之间错综分合的交流。这套丛书便展现了这种多样性和话语特征,当然,非西方世界也会有类似情形。

本丛书分为作者论著和主题文集两类出版。第一类选取该作者对历史话语而言有着重要地位的作品,第二类则选取历史话语中的一些中心主题。每一卷都有介绍该作者或主题的导论、文本注释和文献目录。

本丛书期待对历史学领域中在新的层次上并且是高质量的跨文化交流有所贡献。抱着这种呈现更广泛的意见、立场、论证、争执的雄心壮志,它希望成为跨文化交流中类似研究的范例,使不同文化彼此得到更好的理解。在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领域内,就一种对文化差异彼此了解的新文化来说,这种理解是必要的。

耶尔恩·吕森

2006年5月于德国埃森

序二

近代以来,西方历史思想家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思想资源。历史的观念经过一代代思想家的演绎,构成了多元的话语系统,而且,这个系统还随着思想家们不断的思考、表现而获得扩充。

我们往往通过书本了解思想家们对历史的看法,但对于读者自身而言,我们却不能只是从书本中去理解历史。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历史中,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经历将成为历史,而是指我们身边的每一处能够被言说、被体悟的事情,如果不能获得历史解释,它都无法进入理性的思索之中。从历史中获取意义,获取人生在某个时刻具有的确信性和行动的立足点,这是试图了解历史的人所追求的。但这样一种能力对于个人而言并不是可遗传的或可积累的,每个人都不得不在自己的生活中重新发展它。思想家们对过去的理解与认识、对历史这个观念的思考,以及对与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探询,这些都只为我们耕耘未来生活这块荒原提供各式各样的工具,却不提供秋收的果实。

系统地译介西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作品,一直是20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学者的梦想。这个梦想曾经深藏在何兆武先生年青的头脑中,此后,他身体力行,译著丰卓,为拓展国人的历史思维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今,跨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及国内学术事业的繁荣,使得这一梦想更有可能变为现实。

本丛书有幸得到了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教授的大力支持。吕森教授认为,加强跨文化交流有利于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现存诸种文化可以包含在其中,但它们了解彼此的差异,尊重彼此的习惯,平等交流使得我们可以跨越文化鸿沟,同时拓宽我们理解历史的文化限度。这也是中方编辑者的初衷之一。这样,中德双方

组织者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从丛书框架、选题的设计,到约请编译者,乃至沟通版权,一项项艰巨的任务在数年来持续不断的交流与努力中逐渐得到落实。

丛书编者有着极大的雄心,希望以数十年的努力,将西方18世纪以来关于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重要文献渐次翻译,奉献给汉语世界。如果可能,这套丛书还将涉及非西方世界史学思想的文献。

显然,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跨文化交流的成果,同时也是一项民间的学术事业,在此,我们要对所有帮助这套丛书出版的编者、译者、出版者表示感谢。愿这样的努力,也能够得到读者的关注、批评与认可。

张文杰 陈新

2006年5月

译者前言

胡昌智

本书译自彼得·赖(Peter Leyh)考订的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三卷本的第一卷,1977年斯图加特出版。该书分为三个部分:(1)德罗伊森的最早的手稿,彼得·赖考订整理的完整版,占大半篇幅,该书第1至394页。(2)“历史知识理论大纲”,第395至412页,这是他第一次手稿的大纲,在1857或1858年完成。以上两个部分是德罗伊森首度讲授史学理论时的资料。(3)1882年印行的《历史知识理论大纲》,该书第413至450页。译者译出的是第三部分《历史知识理论大纲》,是条文式的,共九十五条。在重要条文下,译者与耶尔恩·吕森教授选出上述第一部分中相关讲稿,作为条文的补充。这种以讲稿补充大纲的取材方式,目的在以今天的眼光把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的特色凸显出来。

本书翻译因此是以《历史知识理论大纲》的九十五个条文为骨干,而将相关说明(正文中排为仿宋体)附之于部分条文之下。这些选出的讲稿,每一个段落都注明它的出处,以便读者回查原文脉络。同时译者在

译文中偶尔加入补充性的词句,使行文能通畅,譬如:“……,它(译注:历史)……”;译者加入“历史”两字,使文意清晰。另外,正文中需要解释之处,特别是翻译名词无法表达原用词意义时,译者以注释的方式加以说明。文中的希腊文、拉丁文,凡是德罗伊森以括号括起来,用于说明正文中所用的德文词句在希腊、拉丁文中原始意义为何者,都是与正文重复的;为使德罗伊森的用法不失其意义,一律保留不翻译。至于在行文中插入的希腊、拉丁文则在译出同时,将中文附于括号中,以便与上述用法的区分。希腊文的翻译由关子尹先生协助,拉丁文则由内人解说。

除了《历史知识理论大纲》及相关的讲演稿之外,译者还译有该书的一篇附录论文《自然与历史》。这篇论文与大纲中导论部分处理的范围相同,但是一则因为篇幅较大,另则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篇独立的论文,所以没有放入大纲条文之下。

关于德罗伊森的史学理论在近代西欧史学理论史中的地位,以及德罗伊森史学理论与他的政治思想间的关系,吕森教授特别为中文译本写了一篇结构清楚、引论广泛的《引论》。吕森教授研究的范围是近代德国史学史、历史教育学、历史知识理论。这篇引论对读者了解本译文将会有很大的助益,因为它提出的是一个全面性、各论点的关联。

翻译本书,一方面是为了介绍历史主义本身,了解它晚期对自己学科工作方法及理论基础的反省。同时,历史主义在19世纪末以后的转变,当时历史方法学方面的争执以及韦伯因继承了历史主义丰富的思想遗产而造成的方法学上的成就,这些相关问题,借助这本书都可以有进一步的认识。至于对我们自己社会中的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译者深深觉得,这本书还有不是一两句话能道尽的现实意义。

最后,希望读者不至于太为本人的译文所苦。

引 论

耶尔恩·吕森

一 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在 反省历史科学基础方面的意义

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是历史学理论方面最有分量的论述之一,或甚至就是这方面最有分量的论述;不但从知识史的角度可以如是说,而且从知识理论的角度亦复如此。

从知识史的观点看,历史学说明它自己自成一门学科,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这种自我反省的发展在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中,得到高度的实现。历史思考(historisches Denken)的学术化、历史学的兴起、其制度化及其发展,并不只在重现人类过去这种历史写作工作层面上进行;从一开始起,在形上理论的层面——知识史中不可分的一部分——,即在史家说明自己工作的这个层面,历史思考的学术化,就在不断地进行着。^[1]

这种理论上的反省,甚至早于专业历史写作的传

统。^[2]在希腊时代,“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被安排在“历史艺术”(ars historia)的标题之下;当时它是处理历史写作的规则,并且是当作文学作品的技术来讨论。

这一类史学写作技术规则的反省,属于广义的修辞学(Rhetorik)范围,讨论的是如何使思想在公开沟通过程中,转化成有影响力的言论。真正从说明历史思考的学术性这个观点出发,对历史思考的原则进行反省,是18世纪中叶才开始的;也就是说,在政治与社会基本概念取得它们现代的意义时,在思想上有划时代转变的时候,以学术性观点,针对历史思考的原则进行的反省才开始。^[3]

在18世纪下半叶,历史思考产生了一些特殊的形式。这些形式,伴随着近代化的过程、伴随着市民阶级社会的形成及其壮大成为笼罩性的生活方式而出现。新形式的历史思考不但伴随着它们,而且在文化因素上,提供了它们发展的助力。所谓这些新的历史思考活动形式指:以动力、演化的观点,解释人类过去,以及以学院专业立场,推动历史学。这两种历史思考活动的形式,在那时候开始建立,而且,自彼时以降,两者都得到持续的发展。

在德国的学术传统里,纯学术性地反省历史思考之原则,始于1752年克拉顿尼乌斯(J. M. Chladenius)发表的《历史学的一般问题》(Allgemein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4]从那时候起,就有一个从未间断、持续下来的“历史知识理论”传统。在这个传统里,历史学的基础不断地被提出来反省,专业史家希望通过这个反省工作,将他们的专业工作建立、巩固、扩充成为一门道地的学科。这类的反省工作,是学院中实际工作的一部分。它们是学院中讲授的课程,尤其是在彻底的史家学院训练被重视的地方,最重视这方面的课程。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以演讲稿的方式流传下来,而且在他第一次做这方面演讲八十年以后才正式出版。这种情形不

是特例,而是当时专业化史家反省工作的一般状况。

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从许多理由上说,都可以视为是反省历史学基础这类工作中的一个高潮。原因之一:因为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是在历史学的基本架构开始被视为是学院中专门学科的时候完成的;也就是说,他的《历史知识理论》一书,把德国历史主义末期定型时期——19世纪上半叶——的成果表现了出来。它阐明了历史主义显赫的研究成果背后所隐藏的理论关联及方法规则。德罗伊森是自觉地站在历史作品丰硕的成果之上,来申论历史学科的自主性。同时该书也把历史学的通人教育(Bildung)的目的——在这个目的之下,历史主义史学一直主动地将研究成果展现于社会大众之前——明显地勾画出来。

原因之二:德罗伊森把他以前的各种史学知识理论融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德罗伊森承续专业史学之前的演讲修辞学传统,进而讨论历史写作的各种规则及形式,目的是希望也从历史作品呈现方式的层面上,建立起历史思考作为一门学术的正当性。

在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方面,他以教育学的观点、伦理的观点以及政治的观点,提出历史知识对人类生存导向的意义,也就是说明“历史的功能”。同时,他也把从前以历史百科全书方式保存着的,确切不移的历史事实系统化起来,把辅助科学相关的史料考证研究技术详列出来,视之为保证历史作品内容有其确实性的不可弃易的工具之一。

其次,他以方法论观点阐述历史研究的个别方法以及其间的系统连贯性;并且,在知识理论方面,他掌握并条列出历史思考要成为一门学术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原则。

最后,在历史哲学方面,他把凡是能赋予人类过去以意义,能使过去成为有价值的历史的诸种观点都提出来。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方面的)反省工作,在德罗伊森以前的历史知识理论反省工作

中,或以零散的方式分别处理,或被不同的相互搭配方式加以讨论。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相形之下,提出了一套反省的模式,把那些问题结合为一个前后相关的论证,使得史学处理的对象——历史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基础,以前所未有(并且——我愿意说——至今也未再得见)精确的概念,呈现于众人之前。

原因之三:成功的历史研究、历史写作应有的能力,以及历史理论家反省的能力,德罗伊森集之于一身。他有历史研究、历史思考所需要的哲学眼光,同时也有追求政治参与与历史知识结合的毅力,他将这些因素在一己之身中结合得非常成功。^[5]

虽然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起初仅以简略的大纲的方式,为参加他演讲课的学生印行,但是其内容却成了历史学自我反省、建立自我根据这类工作的模范;至少在历史主义的学术传统未被打破之前一直是如此;所以德罗伊森对历史方法的章节编排都被一般的教科书所采用。而且,他的《历史知识理论》一书,更刺激了其他学科对它们自己知识基础的反省。^[6]到目前为止,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仍然算是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自我反省后的一个典范性的自我表达,表现出了历史主义在历史学上所达到的水准。

从知识理论的观点上说,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其特色不仅在于它把历史主义的方法规则与理论概念,广泛又细致地整理表现成一个一直都还具有现代意义(即使不是没有争议)的学术传统。此外,该书论证的水准、它的专业性、它反省范围的广大,以及它分析的力量,都是历史学基础反省方面,至今仍然没有被超过的。

尽管今日历史理论站在反对历史主义,以及站在反对与历史主义相契的诠释学(Hermeneutik)传统上,但是有三个原因,使得今日历史知识理论还是要顾及并上接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的传统。

一、德罗伊森讨论历史思想中能够使它成为一门学科的基本因素及原则时,他是从历史学本身出发,他让历史学的方法及特色彰显出来,而不以其他学科方法上的理想来衡量历史学。

二、德罗伊森将从历史哲学出发的、从知识理论出发的、从法学、从呈现史实理论(Darstellungstheorie),以及从伦理社会哲学出发的各种观点,结合运用,借以彰显历史学基础中各种历史思考活动因素之间整体而系统的关联性。

三、德罗伊森不把历史学学术专业性中,对真理的要求与历史知识在社会脉络中实际所具有的功能这两者截然分开,更不将它们个别孤立起来讨论。他尝试将历史思考活动中,理论性方面、实际性方面、经验性方面、规范性方面对真理的各种要求相互结合。

德罗伊森在讨论历史学的科学性时,能令人同时注意到历史学植在人类生活界(Lebenswelt)中的根,以及历史学对人类生活界的影响与功能。科学性与生活界在德罗伊森的理论中不是以不可消弭的对立姿态出现,它们是一个相关联的整体。

二 关于《历史知识理论》本身

德罗伊森从1857年起,不断地讲授有关知识理论方面的演讲课(一共十七次)。课程以不同的名称进行:历史的方法论与总论(Enzyklopädie)、历史总论、历史总论与方法论、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历史科学的方法论与总论。^[7]德罗伊森认为“历史知识理论”这个用法最好。这个用词最能表达“我们学科掌握知识的方法”(Organon für unsere Wissenschaft)以及“历史的科学理论”(die Wissenschaftslehre der Geschichte)。^[8]

史学知识理论的读者是历史研究者本身,研究者会因此得到

有关自己学科的范围、方法的系统性了解,进而得到对自己工作的认识。德罗伊森的讲演课要广泛回答的是“历史应该怎么学?”这个问题。历史知识理论是要借着说理的论证方式,建立历史学的地位,以协助史家工作的专业化。

因为“历史知识理论”原来主要是为了学生实际学业而讲,因此没有让它出版。出版的只是《历史知识理论大纲》;它先是在1858年,以手稿复印给他的学生,然后在1868年,与一些历史理论的短文构成的附录一起,以小册子方式刊行;其中有德罗伊森对巴克勒(Buckle)的历史实证主义的批判(“将历史提升到科学的地位”)。这个大纲在德罗伊森生前印了两次(1875、1881)。在19世纪末期,当历史主义的历史学科学概念,在理由根据方面,受到日益增加的压力时(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有对实证主义观点下自然科学的羡慕),这篇大纲被译成法文(1888)以及译成英文(1893)。^[9]

1937年,德罗伊森的外孙徐本芮(Rudolf Hübner)据演讲手稿出版了一个《历史知识理论》的册子。此版本发行数量很大。这个版本根据的是德罗伊森晚年讲稿,加上一小部分他早年讲稿的选文。这个版本在文辞考证方面相当不符要求。但是,将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从遗忘之乡中再度拉回来,并且使它成为大家都容易接触到的历史主义自我剖析的重要文件,其功劳也就很大了。

在徐本芮版本出现之后四十年,而有彼得·赖历史考证版的《历史知识理论》第一卷出版:包括复原的1857年演讲稿的全文——据后期讲稿修纂成——与《历史知识理论大纲》的最初手稿印本,以及《历史知识理论大纲》最后的排印本。这个版本悠然又呈现出德罗伊森演讲原初的清晰。德罗伊森的论证、各段的目的,以及当初系统性的篇章安排都又清晰可见,不像徐本芮的旧版本。

彼得·赖的版本中,并没有收录德罗伊森晚期讲稿的所有内

此为试读,全文完整版请访问: www.e123book.com